

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

王 爾 敏

近幾年學界研討經世思想已漸成風氣。今歲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召開專題討論會，於該問題實已達到學者會通交流之盛況。此門研究風氣，原為劉廣京教授開其先河。先是民國六十一年（一九七二），劉氏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公開演講，提出「咸同中興與傳統經世思想之窮途」一文，申論其對傳統經世思想之用心。開始引起學界廣泛注意。嗣後劉氏又在民國六十九年「國際漢學會議」討論集發表有關包世臣及魏源思想研究。可謂十年如一日。而最大之開拓，則因劉氏一力促成於民七十一年七月及七十二年八月，先後在近代史研究所召開兩次經世思想研討會，不惟促使同道學者用心撰著論文，同時更激起後輩青年進而追從研究。此一學術門類，勢將獲得更大開展。

討論學術問題，自應循一確定顯著範圍。否則漫無統緒，難有歸宿，亦不易見出意義。對於經世思想，劉氏思考十餘年，醞釀出其基本觀點，曾於來信中扼要言之，因為構成研討論會創意重點，特別抄錄在此：

「（七十一年）七月二十六日實強、寶千召開清代經世思想研討會。弟必參加。弟建議以嘉道年間為重點，可發掘我國制度改革及思想進化之內在根源。此大題目乃研究儒家思想今日尚未發明之關節。甚盼我兄能共其事。着手處總以經世文編（一八二六）及鴉片戰前之思想為起點。不然則又入「西潮「老套」也。」（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三日信）

劉氏此言，當出於多年熟思。而近代史研究所之召開會議，更是早經多方審慎考慮，並非倉卒決定。故而對於定義界限範圍，我未嘗抱有個人主張。然在此次會議檢討之際，或文字或口說，或若干論文之性質，於經世思想之界域，多少產生一些疑難，甚至亦有猶豫難決之處。此固各學者討論反應必有之結果，亦促使我進而略作思考。提出商榷，以抒一得之愚，用為拋磚引玉。

討論經世詞旨，探本溯源，必然追至儒家流派最早職司。班固漢書云：「儒家

者流，蓋出於司徒之官。」（藝文志：諸子略）近世劉師培加以申解，詳析司徒職事，以治民之官兼教民之責，上下相承，甚為清楚：

夫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者，以儒家之大要在于教民，周官冢宰，言儒以道得民。道也者，即儒者教民之具也。蓋以道教民者謂之儒，而總攝儒者之職者則為司徒。說者以司徒為治民之官，豈知司徒之屬，均以治民之官而兼教民之責乎。舍施教而外，固無所謂治民之具也。試觀周禮地官之職，鄉大夫受教法于司徒，退而頒之于其鄉吏。又州長之官，各掌其教，治政令之法，以其德行道藝而勸之。下至族黨比閭之吏，亦各以治民之職，兼握教民之權。此豈古代在位之官，其學術言行均足為人民之表率哉。蓋所守之職然也。古代地方之吏，以施教于民為專責，與儒者以道得民者相同。意鄉大夫以下諸職，均以儒者充其位。故當時之鄉官，屬於土著之民。進則為鄉大夫，退則為鄉先生。而化民之政，訓俗之權，均操于其手。儀禮士相見禮云。與老者言，言使弟子。與幼者言，言孝弟于父兄。與眾言，言忠信慈祥。與居官者言，言忠信。此即鄉先生化民訓俗之證也。鄉先生如此，則鄉大夫可知。此司徒所司之務，亦儒者所盡之職也^①。

因是可知，親民治事，化民成俗，本為司徒應有天職。儒家者流，由此轉化，而成學派，正可見出淵源有自，職守本原。劉師培並進而說明儒家學派與司徒之關係以及職司之功能：

至于東周，司徒之職漸廢，九流百家，各持異說。惟孔子之說。近于教民。以道德禮儀之言，為天下倡，欲漸復學校井田之制。雖出詞近迂，立身近偽，然在九流之中，與古儒者之學相近者厥惟孔子。故其學以儒家為名。而班志溯其源起，以為出于司徒之官也。特孔子以後，奉其學者，均以儒為名。實則孔子之言，近于古代之儒者。而孔子之所行，則與古代之儒不同。孔子以後之儒，較之古代之儒，其行事尤為相遠。三代以後，其有復古代儒者之職，而得司徒設官之遺意者，一為親民之官。自秦以降，吏治之善，莫若兩漢。西漢文翁為蜀郡太守，常選學官童子，使在便坐受事。吏民見而榮之，由是大化。東漢任延為武威太守，自掾吏子孫，皆令受業，章句既通，悉顯技榮進之，郡遂有儒雅之士。以牧長之官，而任教民之責，與古鄉師諸職相合。此沿司徒之遺法者一也。一為化民之吏，漢書百官表云：鄉有三老

^① 國粹學報，第三十三期，光緒三十三年八月，劉師培：「儒家出於司徒之官說」。

嗇夫，三老掌教化，嗇夫職聽訟。今案教化雖掌于三老，而嗇夫亦得與聞。故後漢書爰延傳曰：延爲外黃鄉嗇夫，仁化大行，民但知嗇夫，不知郡縣。此嗇夫能訓俗之證也^②。

劉氏結論，明確指出，後世儒者行徑，已非古時原有之舊觀。所謂：「故儒者之職，在于訓俗，而不在於傳經。」^③據此當可概見儒家本有職能所在，應以入世從俗教化爲本務。

學術本源出於王官，實爲上古世卿專職技藝，世代傳承之學。若巫、若醫、若祝、若卜、若律、若曆，均非爲民所能得知，故爲王官世守之業，亦可謂之爲官學。東周以後，禮樂崩壞，官失其守，遂漸流爲私學。然官學傳承之規，尚可追考一二遞嬗之跡。近世章太炎辨析頗爲精審，足資參考：

古之學者，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。百姓當家，則務農、商、畜、牧。無所謂學問也。其欲學者，不得不給事官府，爲之胥徒。或乃供灑掃爲僕役焉。故曲禮云：宦學事師，學字本或作御。所謂宦者，謂爲其宦寺也。所謂御者，謂爲其僕御也。故事師者，以洒掃進退爲職。而後車從者，纔比于執鞭拊馬之徒。觀春秋時世卿皆稱夫子。夫子者，猶今言老爺耳。孔子爲魯大夫，故其徒尊曰夫子。猶是主僕相對之稱也。說文云：仕，學也。仕何以得訓爲學。所謂宦于大夫，猶今之學習行走爾。是故非仕無學，非學無仕，二者是一而非二也。（原注：學優則仕之言，出于子夏。子夏爲魏文侯師，當戰國時，仕學分途久矣，非古義也。）秦丞相李斯議曰：若欲有學法令，以吏爲師。亦猶行古之道也。惟其學在王官，官宿其業，傳之子孫，故謂之疇人子弟。疇者類也，漢律年二十三，傳之疇官，各從其父學，此之謂也。（原注：近世阮元作疇人傳，以疇人爲明算之稱，非是。）其後有儒家墨家諸稱，荀子大略篇云：此家言邪學，所以惡儒者。當時學術相傳，在其子弟，而猶稱爲家者，亦仍古者疇官世業之名耳^④。

閱章氏所論，學術官私之轉化，爲學之規矩門徑，以至學派嚴守家法等情，均可豁然明驗，足以了悟官學原始。專門職司，實卽家學世守之本業，一派道術之根源。

② 同前註。

③ 同前註，劉氏文所表甚明：自史記立儒林傳，班馬二史沿之。然後以通經之人爲儒。夫兩漢經生，均以師法相教授，與儒者教民之事亦復相符。惟其所教授者，在於先王之成績，與化民訓俗之義迥殊。名之曰儒，蓋有儒名而無其實者也。」

④ 國粹學報，第二十期，章絳：「諸子學略說」。

再向上追溯，一探古代專官職司之所以形成，實更可自原始社會說起。左傳有謂：「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。」上古人民生存活動，除作戰以保族羣之存續以外，即為其一切宗教性之祭祀典禮，敬天崇祖，禱求護佑。而為部族首長執司各職，即自然形成永久性官守。是以太宰、太宗、太祝、太巫、太卜之屬，俱為上古地位尊貴之高官。自然亦並形成專官專業世守根源，學藝流派，亦由此而出。劉師培就官職起源，以論政教學術創生根本，解析甚為明晰：

民之初生，無不報本而返始。先王因其性以導之，而尊祖敬宗之說起矣。尊祖敬宗之說起，又必推祖所自出，而郊禘之典以興。因郊禘之典以推之，而廟祧以設，壇壝以立。祭禮一門。遂為三代之特典。且古代所信神權，多屬人鬼。尊人鬼故崇先例，崇先例故奉法儀。載之文字謂之法。謂之書，謂之禮。其事謂之史職。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，謂之太史，謂之卿大夫。有官斯有法，故法具於官。有法斯有書，故官守其書。是則史也者，掌一代之學者也，一代之學，即一國政教之本，而一代王者之所開也^⑤。

西方史家頗信學術始於僧侶，亦頗近於中國官職起源。此蓋人類文化起始現象，實有其共同之處。劉氏引據古代禮制，已足辨明淵源。

民國以來，學界翻案之風盛行。世人頗疑劉歆班固之說，反對諸子出於王官。另行倡議出於職業之論。輾轉影響，附和者眾。然又問此種職業從何而來？其答案仍不免回頭肯定出於官守之原路。今考章太炎、劉師培、鄧實等人論著，實於班固未嘗持疑，並列旁證。抑且合乎文化發展與歷史演變過程，甚覺可信。故願引據於此，以見儒家者流原始出於司徒官守。

閱讀「論語」、「孟子」、「中庸」、「大學」，其中儒家先賢所諄諄以教人者，多在於為人為政，持禮樂以訓民治事。實皆司徒官之常行。若近人之謂儒家出於相禮治喪之一種職業，甚難與孔孟言行相符。即謂源於祝官，祝亦古之官守。即謂出於貴族，貴族亦古之世卿。當見職業說之徒驚新奇。自相矛盾，事理扞格，實難令人採信。劉師培所論孔子之言近於古代之儒者。「論語」內容，足為佐證。而出於祝官之說：當時已多爭議，更未被人接受^⑥。

若知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，則惟親民治化，經國濟世之術，應為儒家學術道藝根本，其他皆後世發展擴大而有。歷來儒者之憂國傷時為民請命者，正為其志節

^⑤ 國粹學報，第一期劉光漢：「論古學出於史官」。

^⑥ 王爾敏：「中國近代思想史論」，四八一——五一八頁：「當代學者對於儒家起源之探討及時代意義」。

實踐所應有。孔子周遊列國欲求一仕，後世儒生之熱中仕途，正為求有親民治事機會，實是司徒職責所在。若以今日升官發財之念度之，不免厚誣儒者。儒者本無可自解，端在其言行是否相顧而已，豈可因人言而置國脈民命而不顧。縱觀歷代仁人志士，入人羣而拯焚救溺，本未計及世人毀譽。此正儒者志節精神傳衍所在，所欲研考討論經世之儒，重點即在於此。

在此探討古代儒家，旨在上溯儒者為政淵源，用以確定經世為儒學元本正宗道術，後世雖多變化，而基本成分未嘗消失。惟「經世」一詞竟首見於莊子之書，出於「齊物論」。其語云：「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。六合之內，聖人論而不議。春秋經世，先王之志，聖人議而不辯。」此語因梁啟超引用，遂為今世學者注意。

梁啟超於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冬，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，在學堂為諸生訂立學約十條，其中第九條即以「經世」為目。並申明意旨云：

九曰經世：莊生曰：春秋經世，先王之志。凡學焉而不足為經世之用者，皆謂之俗學可也。居今日而言經世，與唐宋以來之言經世者又稍異。必深通六經制作之精意，證以周秦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書以為之經，以求治天下之理。必博觀歷朝掌故沿革得失，證以泰西希臘羅馬諸古史以為之緯。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，必細察今日天下郡國利病，知其積弱之由，及其可以圖強之道。證以西國近史憲法章程之書，及各國報章以為之用，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。夫然後可以言經世。而游歷講論二者，又其筭鑰也。今中國所患者，無政才也。記曰：授之以政，不達，雖多亦奚以為。今中學以經義掌故為主，西學以憲法官制為歸。遠法安定（胡瑗）經義治事之規，近采西人政治學院之意。與二三子共勉之^⑦。

以梁啟超所認識之「經世」，實累積明清以來數百年流習常識，而加以學術化，使之成為一種學課。其正確宗旨與實質意義，應是等於今日所謂之政治學。至少說其性質亦必相等。

「經世」辭旨，本不深奧，由「經國濟世」一詞簡化而來。同時「經國濟世」亦可簡化為「經濟」，二者應具同等意義。二十世紀以前，意義明確。人人共喻。實與今日所謂「政治」一詞相同，而與今日所謂「經濟」(Economics)一詞不同。在梁啟超羈旅日本期間，尚能作清楚區別。至今日則已完全改觀，此乃日本名詞影響中國之一種結果。

^⑦ 梁啟超：飲冰室文集，卷二，第二八頁。（臺北中華書局排印本）

二十世紀以前，「經濟」、「經世」兩詞頻繁出現，引用「經濟」一詞者尤通行廣泛，久成文牘中常識用語。宜「經濟」一詞，更見重用。然自明代華亭（今上海）陳臥子編輯「皇明經世文編」一種。因使「經世」一詞，傳衍以成廣義之共名。而「經世文編」更成爲後世學者追摹仿效，爭相編著之目標。後世之論經世思想者，自當以經世文編內容性質定其意義，不可另生別詁，以後來觀點奪前人數百年沿習之定名。

十九世紀以來，踵行「經世文編」者眾，而首開於善化賀長齡。實際編校與發凡起例者則爲邵陽魏源。道光六年（一八二六）成書一百二十卷。賀魏二氏鉅例，未言陳臥子編著前軌，蓋僅因襲其名，而未循其法。賀書創制，依六官分部，自較系統完備，門類清明。而例言中所提示者，則有陸氏「切問鈔」一書，實仿其例。

氏里官爵，總彙卷端。考陸氏切問鈔之鉅，乃乾隆四十載所刊。時海峰（劉大櫛）東原（戴震），巋然並存。而風俗時憲，已收數作。殆以切時之言，無須身後始出。今茲所錄，咸據槧本。保無子瞻（蘇軾）海外，未辨存亡，樂天（白居易）時人，已疑今古。彼既行世之書，吾取經世之益，其有見聞所及，確然生存，則止旁注集名，虛其氏字。庶文資乎救時，復例絕夫標榜
⑧。

例言所指陸氏「切問鈔」，並非原書全名。實爲吳江陸曜所輯之「切問齋文鈔」。陸氏此書，上承陳臥子遺規，下開賀、魏之義例。後世之論經世文編者，每推稱陸氏開其先河。陳去病歷述其沿襲淵源：

蘆區地屬吳江縣東南陬，先王父嘗卜居之。以誕生我兩考。其地東走歇浦，西南瀕分湖，與浙之嘉善縣鄰。爲嘉興湖州松江三郡往來之孔道。當明季時，只一村落。近百年來，乃始成市集。故古多賢人長者，陸朗甫曜、郭頻伽馨，其最箸者也。朗甫留心經世之學，其所著切問齋集，原本經術，體用兼賅，實爲一代作者。所輯切問齋文鈔，亦師臥子皇明經世文編之意。厥後魏源賀耦耕輩，追踵成軌，會爲巨編，當世宏文，遂無罅漏。其風不可謂非朗甫開之⑨。

自賀氏之書問世，海內風行，頗有洛陽紙貴之概。而續編踵作，尤見一代盛況。有清一代各家經世策論，能面世者，多被收載。相類之文編巨製，層出迭見，前後不

⑧ 賀長齡：皇朝經世文編，凡例。

⑨ 國粹學報，第十六期。

下二十餘種之多，每每推重賀氏爲創始前徵，而於賀氏編例，尤其多所因襲。

賀魏二氏編次經世文類，依清廷現有六部政制分別卷次。除首列「學術」、「治體」外，其下即依國政之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分別門類。雖可上溯周禮六官，實際六部之制即遵周禮而成。賀書以後，續作者多循此項體例。若張鵬飛之「皇朝經世文編補」。饒玉成之「皇朝經世文續編」。葛士濬之「皇朝經世文續編」。盛康之「皇朝經世文續編」等書。不惟體例相同，而且各書均爲一百二十卷。選例既同，彼此之間亦難免文多重複。而賀氏創制，作者據爲典範。各家編著託爲淵源，敍例稱引，不厭其煩。茲彙錄其要，列表明之：

撰 者	敍 例 節 要	撰 著 年 代
葛 士 濬	善化賀氏經世文編，成於道光丙戌。迄今六十餘年，世局既有變遷，論議因之日積。東鄉饒氏，陽湖盛氏，皆有賡續。饒編出於光緒壬午，盛編迄今未出。夫難莫難於創始之作，備莫備於晚出之本。古來撰述，大抵若斯。故是編之作，訂疎舛於已往，待刪正於將來。前不敢忘東鄉先路之導，後或可備陽湖葑菲之采。八綱六十三目，均仍賀編之舊。惟自道光壬寅（一八四二）後，中外交涉益繁，有非海防塞防所能概者。京師總署之設，既與六官並重。往歲廷臣恭纂穆廟實錄，亦開洋務別爲卷帙。茲師其意，立洋務一綱，繫以七日。曰洋務通論，曰邦交，曰軍政，曰教務，曰商務，曰固圉，曰培才。惟刑法之類，華夷雖時有牽涉，而其要領條目所存，則視他務稍簡。今彙爲律例下卷，仍以隸諸刑政 ^⑩ 。	一八八八年
盛 康	道光初，善化賀耦庚中丞因華亭陳氏有明經世文一編，復踵陸氏切問齋文鈔之例，輯開國以來諸家奏議文集，成皇朝經世文編百二十卷。鉅典宏規，於斯焉萃。言經濟者宗之。道光而後，世變寢尋，於今爲烈。而盡臣志士之所經營而維持者，論議設施，尤資考證。曩歲歷官兩省，即有志蒐輯，以續賀氏之書。聞見日滋，述錄難竟，遂初多暇。命子宣懷益加編次。凡四朝經制事宜，具詳六政。其有關中外交涉者，別爲外編，不與焉。體例悉仍前編，而增其損目，書成卷數亦如之。閱七年，爲光緒丁酉之	一八九七年

⑩ 葛士濬：「皇朝經世文續編」例言。

又同書，俞樾序云：自賀耦耕先生用前明陳臥子之例，輯皇朝經世文編。數十年來，風行海內。凡講求經濟者，無不奉此書爲渠燹。幾於家有其書。自後江右饒新泉氏又有經世文續集之輯。自道光至咸豐同治間，名臣奏疏，私家著述，凡有涉於世道者，亦略具矣。然饒氏之書，一循賀氏之舊。而近來風會日開，事變益繁。如洋務爲今日一大事，非原書海防所能盡也。奉天、吉林、新疆，臺灣各設行省，因地制宜，非原書吏治所能盡也。開礦自昔有禁，而今則以爲生財之大道，非原書錢幣所能盡也。軍國之用，取給抽釐，非原書權勳所能盡也。有輪船以行江海，近又有輪車以行陸，非原書漕運所能盡也。中西算學，日新月盛，朝廷闢館以造就人材，且寬其格以取之，非原書文學所能盡也。此葛君子源所以又輯續編乎，其書凡一百二十卷，爲文千數百篇，其志可爲盛矣，其力可謂勤矣。

陳邦瑞	<p>歲，校刊始畢^①。</p> <p>經世文編，為前雲貴總督賀耦耕先生所輯，凡文字足備經濟，有關治世者，無不蒐采，洵稱大觀。後賢復踵而續之，又有續編三編之出，固早已風行海內矣。方今國家講求實學，廣徵經濟之才，用備維新之佐。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。於是經世文編，都人士莫不家置一編，更覺洛陽紙貴矣。獨是中西人才層出不窮，而奇文偉論之作，亦日新而月異。今鴻寶齋主人（何良棟）廣搜博采，續為四編，付諸剞劂，其較初二三編也尤精萃宏麗。使賀公猶在。得見此編，當亦拜手佩服，引為知己^②。</p>	一九〇二年
端方	<p>自邵陽魏氏陸華亭陳氏吳江陸氏之意撰集皇朝經世文編，採取精采，有神實用。近年江西饒氏、上海葛氏、武進盛氏、迭有廣續，美矣備矣。厥后麥氏有經世文新編之刻，今甘君眠羊又復為之續編，分類仍二十有一，得文五百餘首。嗚呼！何其多也^③。</p>	一九〇二年
于寶軒	<p>昔陸朗夫中丞有切問齋文鈔之刻，賀耦耕尚書與魏默深先生仿之增輯經世文編。綴制樹猷，允稱傑構。嗣江右饒氏彙於前，上海葛、陳二氏續於後。時制遷移，外政遂為當務之急。武進盛氏書出，旁蒐宏要，援例變通，論者謂可方軌善化。然各編家自為書，再三種復，繁縟如毛。丁戊之交，順德麥氏重輯新編。依傍式空，別開生面。茲編宗旨，在於救時，輯成後與諸家學校，芟削雷同，不敢剽竊，第各編類目太繁，如間有失檢之處，識者諒之^④。</p>	一九〇二年
湯壽潛	<p>前清中葉，賀耦齡（耕）氏輯經世文編，本集錄之體，網羅一代之文獻，而萃為一編。久為海內所推重，今者民國成立，掃數千年之專制而改為共和，實史冊未有之盛事。一時偉人學士，如雲而起。對於改革勝朝之宿弊，及發抒民國之新猷，或本其學識，或證諸經驗，於政治學術教化，多所發抒。經世文社諸同志，搜輯兩年來海內宏達之著述，本賀氏之例，而有民國經世文編之刊。體例雖本之集錄，取材則注重於經世，所選百數十家之作，皆一時海內之人望。真所謂一代開國之文獻者也^⑤。</p>	一九一三年

就表列所見，自道光六年（一八二六）賀長齡魏源編輯經世文編以來，士大夫景從踵行，以為當世政學要典。其風氣直延及於民初，形成一代政學集錄典型。殆凡其同時之「時務叢鈔」、「邊事叢錄」、「洋務叢鈔」、「經濟統編」、「策論滙海」、「治平十議」之類，先後不下二十餘種，亦並由經世文編衍生而成。賀氏影響之巨於此可見。

① 盛康：「皇朝經世文續編」自敘。
 ② 何良棟：「皇朝經世文四編」，陳序。
 ③ 甘韓：「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」，端序。
 ④ 于寶軒：「皇朝蓄艾文編」，例言。
 ⑤ 「民國經世文編」，湯序。

經世文編代表一種著錄形式之創制，權輿於明人陳臥子，定型於清人賀長齡。賀魏二氏發凡起例，遂為後世宗風。即使自麥仲華「經世文新編」出版，已不循六政分章之法，而其宗旨形式，內容性質，仍然不出賀氏軌轍。

經世文編，專以輯錄國家庶政之建策，民瘼之救治，弊政之改良，以至時務之討論，洋務之推行。種種文章，均加收載，包羅十分廣泛。然取材不循文家觀點，決不拘於文學規格，是其顯著特色。盛康對於經世文編文章之特有功用及體裁有清楚辨明，見其「續編」凡例：

賀編之成，當時或譏其雜錄官書，有乖文體者。不知經世之作，在行事不在文章，備掌故不備體格。典論云：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。以是求文，難乎其選。必執體格以繩之，則重文章不重行事。傳世徒託空言，經世難期實際矣。茲編所續，一以掌故為主。有因人而存其文者，有因事而存其文者。擇焉不精，未免見咎大雅，而事實所繫，必究始終，辨論各據，不加軒輊，則猶賀氏之志也¹⁶。

經世之實義，雖在近世，必出於儒家者，均由中國廣義之儒而形成。蓋凡國中知書達禮之士，均自認或共認為儒生。抑且所知之書，實皆儒家傳承之各類經典。是以言經世思想與今之政治思想所不同者在此。蓋儒者經世之念基於其本有志節使命。而政治思想則為一種主張見解與政學理論之認識。一為主觀立場，奉為身心性命之學。一為客觀立場，視為一種傳習學科之實現。是以兩者必須有所區別。

儒家自孔子始首重行為實踐，學問則在其次，是故不尚空言。「論語」有謂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力行與為學二者，先後次序釐然。後世漢儒以傳經為正宗，宋儒以窮理為本業。均已與孔子相去懸遠。欲還其舊觀，惟經世最具實踐意義。而「通經致用」一語，即為儒家經世重要原則。劉師培乃追溯儒家六經本旨，經世原義：

蓋孔學既崇實踐，故其書皆經世之書。孔子之初，本來行其道於世，及世不見用，乃垂之空言。六藝者，皆古聖王之政典也。即自著之書，亦專以事理為主，而即基事理以發其道者也。後儒不知孔子之學。於是有揚雄、王通之擬經，有宋明儒者之空說。此皆徒得孔學之迹者也。莊子曰：夫迹履之所出，而迹豈履也哉。後世諸儒，均蹈此弊。惟近世顏李之學，頗能於孔教之

¹⁶ 盛康：「皇朝經世文續編」，凡例。

中求其實用。蓋中國學術之最微實者^⑰。

章學誠：「文史通義」云：「古人不著書，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。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。」此言足為「通經致用」作一註腳。六經即為古之政典，實為從政者所當參考，俾依而治事理民。是以儒者研習六經，原在實用，尤實用於政事。六經之用。「易」以用於觀測世變。「詩」以用於考察輿情。「禮」以用於導民訓俗。「樂」以用於涵泳性情，陶冶人品。「書」為政典範例，是以為君長施政行令之參考。「春秋」以史實案例，俾制斷是非曲直。漢代以來用於斷獄。雖然時效未可測知，而儒家研治經術，則深信其實用功能。若不拘泥經義，引伸加以活用。推至當代文獻典冊，自然即必達於經世文編之屬。

經世乃儒生入世為政宗旨，志在治天下於太平，登萬民於席衽。必定力求革除弊政，創籌良策。但凡經世思想家，雖守六經典訓，而必識世變之乘。各當不同時會，不同難題，思考適應治術，進求改革。此即中國儒生固有之改革動力。非得自於外來習染。各家經世文之續編，自盛康、葛士濬起，實於六政之外，多關洋務門類，正以見出新時代新問題之適應。如盛康於增刪變化之基本觀點。見其續編例言：

賀編門目詳略得宜，既續其書，應沿其例。惟法制損益，與時變通，有未可比同者。如學術之冠以聖學，所以端出治之本。戶政之系以建置，所以寓設守之規。至釐捐開礦，大利所在，不能括之以理財。團練水師，成效已然，不能概之以兵制。籌列戍之需，則屯餉為偏舉；清老林之藪，則山防為虛文。諸如此類，酌為增減，用備要略，而存時制。非漫效兩史之異同，庶足徵四朝之文獻爾^⑱。

由是可見，盛氏之於文編之外別立外編，葛士濬之於文編之內多關「洋務」一門，俱以六政所不能轄，而經國要政所不可免者^⑲。

^⑰ 「國粹學報」，第十七期，劉光漢：「孔學真論」。

^⑱ 盛康：「皇朝經世文續編」，例言。

又同前書，例言云：「中葉震業，事尚權宜，條約紛歧，更變迭出。言交涉者，遂為當務之急。專稽經制，似非切要。然使內治外交雜出於六政，既莫識變遷之跡，亦難踪撫馭之機。故茲編皆經制事宜，詳著中興之所由，以徵實效，而資策勵。其有關交涉者，擬輯為外編，別立門目，而疆界籌備及洋藥之類皆附焉。

^⑲ 葛士濬：「皇朝經世文續編」，于鬯跋文云：「光緒丙戌（十二年），長沙王益吾先生（先謙）視學江蘇，刻「勸學瑣言」，分送士子，中及賀氏經世文編。謂當世必有高才能讀之者。子源（葛士濬）是書，因此而作。方初作時，鬯期以十年，婁邑張君且曰終身，君必執三載當成。今不及三年且成矣。君少承先德恪庭先生之教，家學甚偉。又克自奮勵，與同志諸子，日夕討究，好談經濟，不屑為章句詁訓之學。宜其撰述博大，可觀如此。顧其成之速有足奇者。書中六政之外，別立洋務一類。則鬯與君商定者，其他去取，皆君自主。

在此應當進而思考中國政治制度之重大問題，中國近世儒生之思想觀念，俱能隨世勢演進而提出應變之方，然終未能自救其國而至國勢愈益衰歛。其重大關鍵首在於外力之壓迫。不平等條約之束縛不能突破，宛轉於帝國主義者強權控制之下，中國甚難自立。而在中國政制本身亦有其重大缺陷。是即自唐代以來相承已久之六部制度，實循周禮六官遺意，是以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六個天然格局，以定國家要政為六大系統。使國家大政，地方庶政，永遠陷於六大門類。其在農業立國之世，尚可應付。而至於十九世紀，則不足以適應列強競逐之複雜世局。每有改革變法之言論，每至於實政制度，則均無法突破，此中國本身制度上僵化錮閉之大病。戊戌（一八九八）變法之決心改革，尙未能絲毫改動制度根本。直至一九〇一年，辛丑議訂和約。仍因外國之壓迫，始打破六部大政局面，開始增設外務部，並列七部之首。其後不久即有商部之設立（一九〇三）。中國本身政制之困局始得解放蘇息。

然則，就傳統經學而言，經世思想家未嘗不可以引據尚書洪範之八政，以突破周禮六官之僵局。如尚書所載八政云：「一曰食，二曰貨，三曰祀，四曰司空，五曰司徒，六曰司寇，七曰賓，八曰師。」無論何時而論，洪範八政，實優於周官。蓋其具伸縮彈性，可以增減變化。尤其以農食財貨列最先，軍政列最後，更可見出先圖富而後求強，置國家於安定穩固基礎。真是建國良謨。至於周官之所以歷世用為政制所本者。在其本身純為一種官制之書，並實有分職官名三百餘，儒生思考所及，必以周禮為先，亦自然之理。而中國近代守此制度，所受弊害，實難估計。在此正可概見中國傳統政治政術所能達到改革之極限。儒家經世思想可以超越現有政治環境，但不能在實際行動上突破由儒家經典所形成之固有政制。真是中國近代之重大難題。

質言之，所有經世儒家，始終在六部制度之政體結構下要求改革，而不能就時勢環境需要，要求政治體制之根本創新與改變。龔自珍雖曾略提八政，稍見改制之動機，亦未提出具體創制論說。直至戊戌變法之年，儒生官僚，已討論到改變政制問題，並亦達於朝廷作變法之參考，實正展露全面改制契機。正有待於明主採擇施行。當為儒生經國政術之重大突破與最高表現。經世家之適應世變之建策及其真實功效，均可得到肯定之評價。可惜被八月政變所破壞，形成中國歷史上曇花一現之光輝，真是儒生之嚴重挫折，經世家變法新機之破滅。滿清政權最後自救之機固已從此喪失，而中國二千年儒家經國濟世之政術，亦至於氣運俱盡。

戊戌以後，迅速進入二十世紀，向來經世之儒，可藉科舉而入仕，傳經與窮理之儒尚可憑書院學塾而教育士子。但至光緒三十年甲辰恩科以後，科舉廢而入仕之途絕，學校興而書院之產奪。儒生自此失業，經學瀕於淪亡。真所謂時勢變易，全局崩解。閱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王闓運函，可見學宮、書院隨世轉變而損壞之速。

闓運因船山書院命終，特來料理後事。山川赫怒，一夕蕩沒無存。彭雪琴（彭玉麟）六萬金之工，僅存泥沙。天廢不興，于茲徵信。鄙人遇災不懼，後天奉時。暫避城中，俟九疑還舟，仍歸山塘避暑。昨過清泉學舍，垣牆盡圯，水亭傾倒，昔年觴詠地，遂成泥坑。亦不待裁教官改學司，費青年英雄立憲也。端撫一來，湖南全省化爲異族。昔與郭筠仙（郭嵩燾）論王文韶不能亡湘，今端方竟能變湘，弟之無能如此，亦何顏更設臬此，再列小腳。唯有拜受康子（康有爲）之藥，飽啖陽虎之豚，以卒餘年而已^②。

大抵自戊戌以後，儒家經世懷抱已無機再有用世之日。即退隱傳經，避世窮理，亦已失去安身立命之所。世變酷烈，無術可挽，令人無限慨嘆。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國父誕辰寫於中央研究院

^② 王闓運：湘綺樓箋啓，卷七，第七至八頁（文海出版社景印）致鎮局協辦。